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国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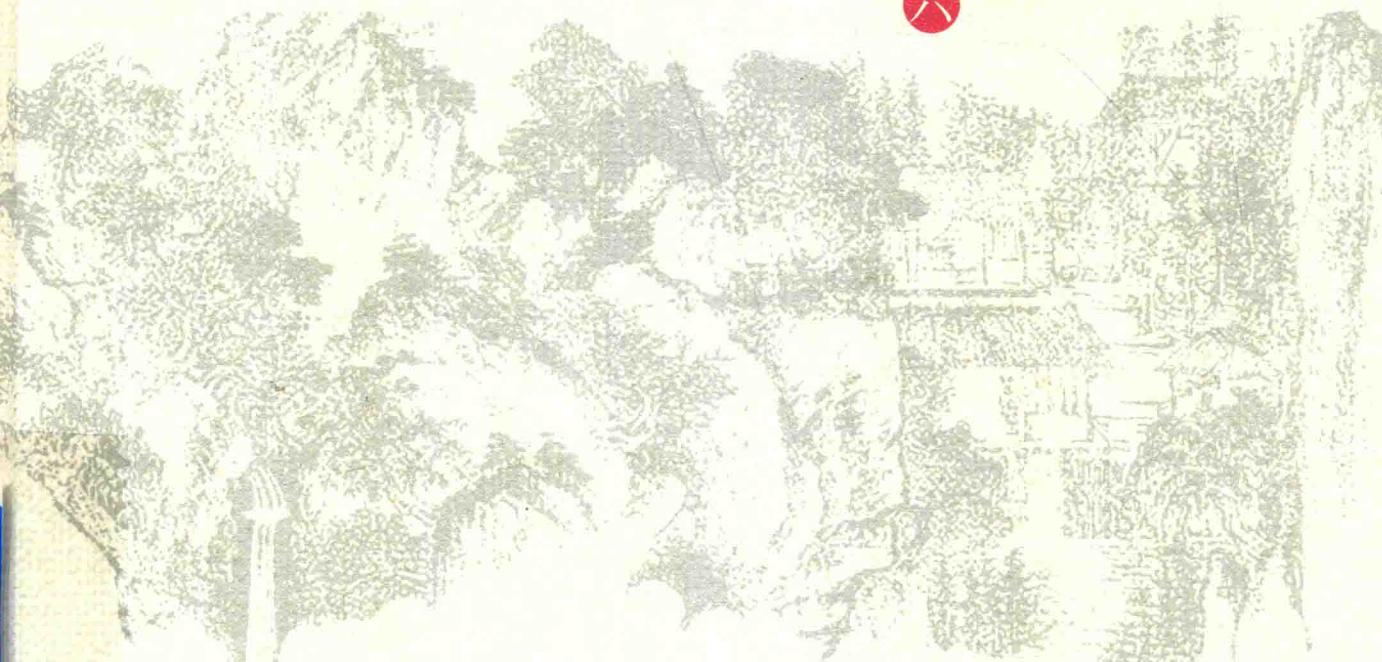
精华集成

第一辑

历史脉络

卷六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总主编 詹石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重大项目
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中国福清石竹山道院文化建设重大项目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历史脉络 卷六
第一辑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一辑,历史脉络:共6卷/
詹石窗总主编.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ISBN 978 - 7 - 5439 - 7222 - 3

I. ①百… II. ①詹… III. ①道教—文集 IV.
①B95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0752 号

选题策划:张 树

责任编辑:张 树 苏密娅 杨怡君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一辑《历史脉络》

詹石窗 总主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190.25 字数 3805000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9 - 7222 - 3

定价:4620.00 元(全 6 册)

<http://www.sstlp.com>

百年杏学精英集成

第一辑

历史脉络

卷六

分辑主编 ◎ 郭 武

编校 ◎ 王家强

赖徐刘刘
全菲陶莉
白娴棠

《历史脉络》卷六

明清以来的道教/区域道教/少数民族道教

目 录

明清以来的道教

| | |
|---------------------------|-------------------|
| 清末金丹道教起义初探 | 顾奎相(3) |
| 天地会与道教、白莲教 | 何正清(11) |
| 太平天国与道教 | 周志初 华国樑 吴善中(18) |
| 明清时期云南道教的发展 | 郭 武(24) |
| 明清时期武当宫观经济收入初探 | 杨立刚(30) |
| 明王朝与武当道教 | 唐大潮 石衍丰(34) |
| 明清茅山宗寻踪 | 曾召南(40) |
| 明太祖朱元璋与道教 | 卿希泰(47) |
| 试论明王朝对道教的管理 | 罗 卡(53) |
| 《红楼梦》所反映的清初道教的世俗化 | 张耀武(58) |
| 明后期至清嘉道间统治者对道教的打压及道教的理论攀附 | 周 勇(62) |
| 宁王朱权与道教 | 姚品文(66) |
| 试论清后期金丹道教与帮会组织的融合 | 赵 志(70) |
| 明初道教与政治之关系 | 张继禹(76) |
| 宋元明时期真武庙的地域分布重心及其历史因素 | 周晓薇(81) |
| 明代的道官制度 | 吴受琚(91) |
| 明初城隍祭祀 | |
| ——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 | 赵轶峰(93) |
| 清代笔记小说中所见广东道教 | 吴晓蔓(104) |
| 试论明清道教与民间宗教中的女性问题 | 张芮菱(115) |
| 明清全真道在茅山的传播略识 | 何春生(121) |
| 近现代中国道教的爱国主义传统 | 赵宗诚(126) |
| 明清内丹思潮与陈撄宁学派的仙学 | 张广保(132) |

| | |
|--------------------------------------|----------------|
| 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解析 | 习五一(142) |
| 民国时期广州道教掠影 | 刘向明(152) |
| 近现代社会中的四川全真道 | 郭 武(154) |
| 改革十年中的道教 | 章 明(163) |
| 兰州道教的历史面貌及现状概述 | 彭清深(168) |
| 与改革开放同行的上海道教 | 上海市道教协会(171) |
|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求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苏州道教发展历程回顾 | 熊建伟(175) |
| 喜看三秦道教变化 见证改革开放成果 | 胡诚林(181) |

区域道教

| | |
|------------------|----------------|
| 香港道教 | 黄兆汉 郑炜明(187) |
| 庐山道教文化概述 | 陈 岚(197) |
| 澳门的道教 | 黄兆汉 郑炜明(200) |
| 道教在云南 | 杨学政 郭 武(207) |
| 上海道教及其道观文化 | 丁常云(214) |
| 吴地道教概述 | 孙亦平(222) |
| 贵阳道教源流及派别 | 王守文(231) |
| 崂山道教及其在中国道教史上的地位 | 刘怀荣(237) |
| 平都山道教史迹 | 王 卡(244) |
| 吉木萨尔和阜康的道教探讨 | 戴良佐(252) |
| 敦煌道教试述 | 邵文实(255) |
| 江西道教概说 | 郭树森(265) |
| 岭南地理与道教传播 | 吴重庆(269) |
| 四川地区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研究 | 白 彬(274) |
| 广州道教仙迹钩沉 | 潘志贤 杨洪校(282) |
| 临海道教历史概要 | 任林豪(288) |
| 临沧地区道教的发展及其现状 | 施刘怀(291) |
| 瓦屋山道教文化考察刍议 | 卿希泰(295) |
| 鄱阳道教史略 | 胡永寿(304) |
| 台湾道教的历史、现状及其宗教特征 | 黄海德(306) |
| 浙江道教史发凡 | 孔令宏(314) |
| 道教碑刻揭示的浙江道教史 | 徐雪凡(322) |
| 闽台女神信仰的文化内蕴 | 黄建铭(332) |

| | |
|---------------------|----------------|
| 宋元明清时期江西全真道发展述论 | 陈金凤(335) |
| 全真道在吴中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 熊建伟(347) |
| 武当道教纪略 | 杨立志 郭顺玉(353) |
| 川渝地区尔朱仙传说的历史学考察 | 唐光孝(360) |
| 晋东南地区二仙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庙宇分布 | 张薇薇(366) |
| 山西道教历史发展特点析论 | 贾发义(377) |

少数民族道教

| | |
|-----------------------|------------|
| 少数民族与道教 | 钱安靖(391) |
| 张陵五斗米道与西南民族 | 王家祐(397) |
| 巫、道思想和壮族文化的结合 | 方素梅(405) |
| 近现代瑶族宗教的道教化及其特点 | 张桥贵(411) |
| 贵州民间道教与傩坛 | 庹修明(419) |
| 道教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 杨健吾(434) |
| 宗教传播中的变异 | |
| ——以道教对云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影响为例 | 郭 武(441) |
| 道教在海南黎族地区的传播与民族化 | 符和积(452) |
| 从百越巫鬼信仰到汉式佛道宗教 | |
| ——闽南民间信仰历史变迁的分析 | 彭维斌(458) |
| 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 | |
| ——以道教文化的影响为中心 | 张泽洪(465) |

百年道学精英集成

第一辑

历史脉络

卷六

明清以来的道教

区域道教 少数民族道教



明清以来的道教

清末金丹道教起义初探^{*}

顾奎相**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在今辽宁西部爆发了规模浩大的金丹道教起义。起义的英雄们奋战在“东连奉省，西接热河，南靠迁安，北通藩部，方圆数千里”^①的土地上，“毁教堂”，“拒官兵”，“焚衙署”，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和外国侵略者，使“京师为之震动”^②。

这次农民起义，实质上是近代中国人民一次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也是同年全国各地反教会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过去鲜有专文总结其历史经验，他们的英雄业绩庶几无闻。现仅就这次起义的历史背景、发难经过、失败原因和历史作用予以初步探索。

—

清政府和蒙古封建王公，对贫苦汉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激起金丹道教起义的首要原因。

清初，统治者威慑蒙汉联合造反，实行蒙汉分治政策，制造民族隔阂。自康、乾之后，清廷“移居汉人于近边蒙旗，名曰借地安民，实行拓殖实边政策”^③。于是关内汉族贫民迫于生计，纷纷亡命热河、朝阳一带。

清政府为强化北部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④，便笼络蒙古王公，把全部土地和山林做为采邑“分封给蒙古王公、贝子、贝勒”^⑤，迫使广大汉民租种他们的土地，从中“勒增汉民租价，侵夺人家生产”^⑥，结果农民终岁劳苦，还是入不抵出。偶遇丰年，王府便派出爪牙，“攘夺余粮，抢劫牲畜，比比皆是”^⑦。蒙古王公还自称“占山户”，把山上土、木、石、柴及牧场皆攫为己有，汉人需用必须高价购买，买时还“不准自行运输，必用蒙古车马乃可，设有

* 本文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45—50页。

** 顾奎相，1939年生，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3038页。

② 樊国梁编：《燕京开教略》，救世堂（出版），光绪三十一年。

③ 汪国钧：《蒙古纪闻》。

④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六。

⑤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台北：食货出版社1977年版。

⑥ 同上。

⑦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100页。



犯者，罚钱鞭楚，收官充公”^①。汉民若进山砍点柴草被王府发现，“随意鞭挞辱骂”，如伐棵小树要受“十无一生”的酷刑，即剥光犯人的衣服，用碗口粗削尖的小树，“将人撅在半空旋即落地，摔得脑浆崩裂，其草菅人命，惨无人道大率类此”^②。领导起义的重要首领潘岳淋因“砍伐山木，素与蒙古积有嫌怨”^③。另一首领齐洛师的胞弟和胞侄，就是在山上砍点柴草，先后被“蒙古旗拿获，惩办身死”^④。广大汉民不只经济上受剥削，而且政治上受压迫。如汉民路遇蒙古王公，无论男女老幼，必须“规避路侧”，稍有怠慢，则“飞骑骤至，鞭笞备尝”^⑤。因此，汉族贫民对蒙古王公“恶感日深”，“报复之谋愈加逼迫矣”^⑥。

其次，贫苦汉民在深受国内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同时，又惨遭外国教会的蹂躏，这是激起金丹道教起义的又一重要原因。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为“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⑦，用宗教作武器对中国进行疯狂的文化侵略。10世纪30年代，外国传教势力窜入辽西地区。1841年，法国传教士方·厄玛呶在朝阳松树嘴子村建立天主教堂，作为热河、朝阳一带的传教据点。之后朝阳、赤峰、建昌等地相继建起洋教堂，到金丹道教起义前后，刚刚半个世纪，这个地区已有教堂和会所一百五十多处，有教徒万余人，教堂附设的学校和育婴堂近百所。

外国传教士及其豢养的忠实信徒，与清廷官吏、蒙古王公紧密勾结，凶狠地扼杀金丹道教的革命活动。比如，建昌县三十家子（今凌源三十家子）天主教堂，当时有两名外国神甫，为镇压金丹道教，从天津秘密运来毛瑟快枪，卖与喇嘛庙和蒙古王公。群众侦悉后，“夜间聚众十余人，越墙而入天主堂抢快枪，不料内中有备，去者均被打死”^⑧。之后又有三、四名“被捉去未见出来”，还借此向清朝地方官吏“任意指控某为金丹道匪，致被官府抓去多人”^⑨。人民群众惨遭教堂杀害的事件屡屡发生。又比如，1891年4月间，天主教堂教民以“借粮”名义，搜刮群众。金丹道教教徒林玉山、徐荣“皆往理论口角”，徐荣当场被枪杀，林玉山逃脱。另外，更残忍的是拐骗和惨杀无辜儿童。此事就连血腥屠杀起义军的刽子手叶志超也不得不在布告上公开承认：“斟验该教堂内地窖有小孩尸身无数，并搜出幼女二三十名。”因教堂的累累罪行，群众与教堂“结怨已深”，决心驱逐“天主教堂意在报仇”。

再次，贪官污吏的掠夺和勒索是贫苦汉民奋起反抗的另一重要原因。恩格斯指出：“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捐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⑩金丹道教起义时的清王朝，接近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上更加腐朽黑暗。清廷各级官吏竟相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和勒索。正如朱寿朋所写：“热河近年，政以贿成，婪索相竞，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寿有贺仪，到任有规礼，补缺署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街

① 汪国钧：《蒙古纪闻》。

② 《朝阳县志》卷三十三。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028页。

④ 同上书，总第3043页。

⑤ 汪国钧：《蒙古纪闻》。

⑥ 同上。

⑦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92—593页。

⑧ 据杨桂芳：《反学好》笔记。

⑨ 同上。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第145页。

市铺户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① 热河历任都统，贿赂公行，卖官成风。知府和各州县官吏极力效仿，“贪婪尤甚”。承德府知府启绍，“诞妄浮夸，贪婪夙著，横索所属州县赃款，盈千累万”^②。建昌县知事章奏凯贪婪腐败，不理政事，专门钻营贿赂，当时邑人送他个诨号曰“钱褡子”，遇事“非钱莫办”。各级官吏的盘剥，使穷苦汉民必然铤而走险去求得生存。

另外，饥寒交迫的穷苦百姓，饱尝人祸的同时，还频遭天灾的袭击。热河所属平泉等州县，“自同治年间，山水成灾，光绪九年水灾尤甚，平泉地面本是出粮之所，连遭两次大水，一带膏腴之田均被冲坏，其水退后，遍地是碎石巨沙，已是不堪种作。十一、二年，又遭水歉，虽有零星地亩亦与石田无异”^③。时至光绪十七年，“春旱夏涝”，八九月间，“霪雨为灾”，群众中的反抗情绪如同干柴烈火，一触即发。

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已经危机四伏、摇摇欲坠，农民阶级的有识之士乘机利用金丹道教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举事。

金丹道教的总教首杨悦春，是敖汉旗贝子府南部杨家湾子村人，乡村医生，他以行医为名，到处发动群众，他创教多年，平泉、建昌、赤峰、朝阳四县的汉民，被他组织起来不少。另一组织者李国珍是活动在“赤峰一带总教首”^④。该教是由白莲教演变来的。白莲教起于唐、宋民间，清时成为反清的秘密组织。道光年间，川、陕、豫的白莲教徒潜入朝阳县内，至光绪初年，在该县东南方的“炒米甸子、碾盘沟等村设立教堂传教……夜集昼散”^⑤。此教初期仍称白莲教，后因朝廷明令禁止，民间讳言，杨悦春、李国珍鉴于热河一带瘟疫流行“死者枕藉”，研制一种草药——金丹，传云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佛化金丹，凡入道者服此药，可免大灾大难。由于此药有防疫作用，所以百姓对金丹崇信至极。杨悦春、李国珍等人遂将白莲教更名为金丹道教，它的八字真言是“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其“反清复明”的宗旨同白莲教毫无二致，金丹道教徒也自称“白莲金丹是一家”。时过不久，金丹道教又被清廷官吏识破禁止。该教的组织者们，为保存组织，继续发展壮大革命队伍，迅速将金丹道教改称“学好会”。该会“假以劝人学好为名”^⑥，亦是“劝人吃斋行善，故士人亦称学好者，例不食烟酒，名以学好诱人，实以烧香聚众”^⑦。清廷官吏对之无可奈何。从此“学好”以半合法的身份得以存在和发展。杨悦春首先在自己家乡敖汉旗杨家湾子村设立教堂，“日久蔓延滋长”，如石立虎、白权沟、曲连沟、菜毛子沟、上下长皋、金厂沟梁、红山嘴等村均有教堂。朝阳属地老爷庙、波罗赤、北三家、八角山，建昌属地叨尔登、松岭子、茶棚、三十家子、雹神庙、山嘴子、北炉、四官营子、三台等村相继设立教堂。这些村庄“除蒙古人外，所有汉人尽……入其教”^⑧。至光绪十七年秋，杨悦春、李国珍见“人心已得，以为机不可失”^⑨，决计发动起义。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3098页。

^② 《德宗实录》卷三百零三，第6—7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050页。

^④ 同上书，总第3049页。

^⑤ 《朝阳县志》卷三十三。

^⑥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038页。

^⑦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

^⑧ 同上。

^⑨ 《朝阳县志》卷三十三。



二

这次起义的经过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段：举旗发难。

金丹道教酝酿起义的时候，敖汉旗贝子府有所察觉，调派一千多名蒙古兵，“托词打猎，实欲剿杀金丹道教”^①。杨悦春、李国珍立即在杨家湾子召集各教堂首领会议，决定“乘蒙兵未齐”立即起义，起义的宗旨是“扫胡灭清，取得帝位”^②。

贫苦汉民为仇杀蒙古王公、仇杀天主教，“泄多年之积愤”，“咸乐从之”。不多时就有千余人齐集杨家湾子。按青、黄、赤、白、黑五种色旗，分为五队。于光绪十七年十月十日（夏历，下同）午夜正式起义。

进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敖汉贝子府。杨家湾子距贝子府仅三十里，起义军半日即到。战士们“鸣枪射击，群相围攻”^③。府内王公听到枪响，“具各胆战魂飞”，守府的蒙古兵亦“惊慌失措，枪不能放，均而弃之各逃生命”^④。十二日黄昏，起义军由贝子府一位姓王的木匠作内应，“窃开府门”^⑤一举攻入，将“盟长及其福晋、大阿哥、三四名格格，统统杀死”^⑥。并把贝子府堆积如山的珠宝、金银、衣服、米粮和骡马，全部运走，“一无所余”。起义军首战告捷，军心大振，民心大快，分散在各地的金丹教徒，“咸皆揭竿而起”，从四面八方涌向贝子府，参加革命队伍。

为“断清祚于斯时，拯黎庶于水火”^⑦，夺取革命的新胜利，起义军正式成立领导起义的指挥部，改贝子府为开国府。杨悦春被拥为开国府总大教师，李国珍建号扫北武圣人，王增为右丞相。其余各首领以王、侯、军师、元帅、付帅、先锋等分封有差。同时，用布告形式颁发“十三条戒律”，基本内容是：义军每到一处，接管蒙古王公的“图章印信，安抚百姓”；严禁抢劫农户商贩，毁坏财物；“选拔丁壮，编入队伍”；“所获财物，均须上缴送官”；义军大臣和将领，不得凭借职权，“滥用亲友”，临阵之际，严禁“阵营不整”“器械不备”；交锋之时，要勇猛冲锋，不得临阵逃跑；义军斥候侦察时不许“谎报军情，弄虚作假”；义军纠察不得“酗于烟酒，欺凌老弱”；义军官兵“进退均有标记”，不得任意行动；军兵百姓不得对蒙古王公“庇护”“隐藏”和“循情卖放”。凡违戒律一条者都要按“军法处置”。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义军首领的革命决心和远见卓识。

第二段：胜利进军。

起义军成立指挥部之后，便分北、南、东、西、中五路大军“分兵占地”。

北路由北平王李国珍率领。此路进军比较顺利，从开国府出师，直插敖汉边境，在撒里巴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050页。

② 《朝阳县志》卷三十三。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汪国钧：《蒙古纪闻》。

⑥ 《朝阳县志》卷三十三。

⑦ 李玉廷：《金丹道教起义亲历记》，《昭盟档案馆政协文史资料卷》一百二十八。

村将海林王打得“全军覆没”；在翁牛特旗的旧庙，又同原敖汉扎萨克特王和翁牛特旗贝勒遭遇，蒙古兵一触即溃，扎萨克特王只身逃跑。至此义军北伐势如破竹，十一月十日，占据翁牛特旗治所乌丹城。又从该城北到那林沟、巴林王旗，八十余里地面，设立二十余营，按八卦方向，混立名目，每营驻步兵或骑兵一二百名或二三百名不等，“具听李国珍号令”^①。为壮大队伍，“积草屯粮”，李国珍留梁贵成守乌丹城北大寺，自己亲率大军继续前进，“直犯赤峰北面”。

南路由南平王徐立率领。此路出师不久就压向朝阳县城，十二日黄昏发起冲击，次日凌晨起义军全队入城，县官廖伦明狼狈逃窜到七道岭。十月十九日，南路军又从朝阳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至东土默特的红帽屯，该旗所管兵丁被击毙一百六十多人，“余皆逃散，不知所往”^②。十月二十八日，起义军继续挥师前进，一直攻到奉省边界的朝北营子。

东路由东平王齐鲜统兵，一鼓作气进攻蒙古真（今阜新），蒙古真王不曾对垒就逃之夭夭。中路由中平王冯三镇率领，进军东盟边界，截击清朝西进援军。此路大军行至下洼，受到地方团练阻截。中平王留兵一部与之厮杀，自带二千精兵，由“山路直取奈曼”。十五日攻入奈曼旗界，占据扎萨克衙门，所有庙宇、档案“均被烧毁”^③，旗仓备存仓粮军械统归起义军。

西路由西平王孔庆广率领，杨悦春、王增随军亲征。这路大军的西征途中，得到海棠川一带起义军的有力声援和支持，横扫了喀喇沁王旗的蒙古王公，并将该旗的“喇嘛庙、天主堂焚毁无余”^④。当兵临建昌城下时，“县知事无力抵抗，只好紧闭四门”^⑤。

各路雄师的胜利进军，对分散各地的金丹道徒是极大的鼓舞和发动，纷纷起义响应。十月十日，平清王付连信，在建昌县南部高尔登（今凌源县叼尔登）和松岭子一带发动起义，十月十六日“焚毁建昌三十家子教堂”。二十八日，进攻建昌县城。除此，建昌所属的叶柏寿、卅家子、瓦房店、五官营子、老波沟、黑水；平泉州所属的榆树林子、老婆子山；朝阳所属的黑城子、老崖沟等地，“大小股匪，同时响应，或多至二三千人，少亦数百人，盘距险要”，“势成燎原”^⑥。起义队伍迅速壮大，“旬、月之间，由数千聚至数万”^⑦。

金丹道教从十月十日起义到该月底，连续作战，蒙古兵和地方团练，不堪一击。因此，这是义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节节胜利阶段，也是起义军蓬勃发展阶段。

第三段：走向失败。

由于起义军的蓬勃发展，京师大为震动，光绪皇帝饬令奉天、直隶、热河三路派重兵围剿。直隶提督叶志超统领两万官军，由芦台出喜峰口直趋平泉州，再从“建昌、平泉分路进剿”。左宝贵统领二万奉省官军，由“朝阳东北两路节节前进，会合夹击”^⑧。

从十月二十日以后，起义军和官军相继遭遇。官军在天主教堂和地方团练的密切配合下，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047页。

^② 同上书，总第3023页。

^③ 同上书，总第3060页。

^④ 汪国钧：《蒙古纪闻》。

^⑤ 李玉廷：《金丹道教起义亲历记》，《昭盟档案馆政协文史资料卷》一百二十八。

^⑥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052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书，第3027页。



对各股起义军疯狂进攻，起义军由攻势逐渐变为守势。尽管起义军英勇顽强，终因寡不敌众，一个个被官军吃掉。直隶官军由平泉攻入建昌后，三十家子、高登、瓦房店很快落入敌手，接着在建昌近郊五官营子展开激战，虽然起义军浴血奋战，但同强敌相持不久就失败了。这次战役后，孔庆广领导的两路军受挫被迫向开国府方向撤回。直隶官军分为两路继续由西向东追击。一路由“建昌一带，节节进剿朝阳”；一路由“五虎、马梁、老河川攻剿喀拉沁旗”^①。十月二十八日晨，由东向西围剿的奉天官军，在朝北营子和南平王率领的起义军接火，起义军“抵死抗拒”，最后退入烧锅当铺院内，凭高墙死守，直至黄昏，一千余名起义军战士英勇牺牲，著名首领潘岳淋被俘，齐洛道受伤遭擒，被押到省。

十一月十五日，北路义军在乌丹城北大寺同官军展开激战，寺破，梁贵成父子被俘。官军又继续北犯，十六日在那林沟与义军遭遇。他们便四路夹击，“用快枪横攻”，致使义军五百多名战死，将帅张双、付帅周宽壮烈牺牲。当官军到头分地时，那里前后两庄相连，尽管“沿墙炮眼极多，向外施放，一于如雨集”^②，但官军“扼要堵截”，终于攻破两庄，义军元帅牛呈祥被俘。北平王李国珍“欲乘官军竟日血战，兵力疲乏，就势取胜”^③，亲率起义军“数百呐喊而来”，打得官军马步哨官缪自成、步兵哨官尚鸿恩、哨长林荫元均受枪伤。李国珍自料不能取胜，率众退往乌丹城，途中被俘。这位叱咤风云的农民英雄，坚贞不屈，被“押赴通衢，凌迟枭示”。

起义军各路相继失败后，官军集结重兵，由芦台练军记名提督聂士成统领向起义军大本营开国府一带围剿。两军首先在距开国府四十四里的门户下长皋展开决战。十一月十三日，官军三面围攻，起义军以逸待劳，“闭门死守”。官军“猛而攻之，待伤精锐，合而围之，势必死守”，迫使官军改变战术。即在八日子时，一面佯攻下长皋，一面派兵冒雪驰往开国府，趁天色未明突然发起猛攻，起义军仓促应战，结果开国府很快失陷。义军首领王正、王福、冯二英勇阵亡，一千多名战士为保卫大本营壮烈捐躯。之后狡诈的官军急速回兵下长皋，该处已被围八九日，“人众食少，粮草缺乏”^④，开国府陷落，这里孤立无援，官军用过山炮将前门攻破，一千余名起义军英勇战死。

官军围攻下长皋时，杨悦春欲赴北路调兵救援，因“官军围困甚密，未能来援”，他便到色力虎金厂沟山洞躲藏，“意图乘间复出”。十一月二十八日黎明，杨悦春父子、叔侄六人被俘，金丹道教起义至此基本失败了。只有其余部继续战斗。光绪十八年四月，朝阳东与奉天毗连处，“马贼不时窜扰”，平泉、建昌一带，“山谷丛杂，伏莽未净”^⑤，乘机打击蒙古王公和清廷官吏。但众寡悬殊，最后也都归于失败。

三

金丹道教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3001—3002页。

^② 同上书，第3047页。

^③ 同上书，第3048页。

^④ 同上书，第3036—3037页。

^⑤ 同上书，第3101页。

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①。金丹道教起义是一次自发性的农民武装斗争，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起义者们不可能认识到清王朝统治的阶级实质，因而提不出明确的斗争纲领和策略，所以革命不可能深入持久取得最终胜利。正因为如此，在具体问题上导致起义军有三个方面的弱点：

第一，宗教迷信的副作用。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为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借用神权对其剥削对象进行欺骗统治。由于生产规模狭小和生产力十分落后，贫苦农民不可能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而受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愚弄。金丹道起义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白莲教加以改造，注入新的革命内容，用以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十几年的工夫，将平、建、朝、赤四州县的群众广泛发动起来，说明宗教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宗教迷信毕竟是消极的意识形态，“上天所定”之类的宗教预言经不起现实斗争的考验。起义如火如荼地展开后，把宗教迷信做为精神力量，把初战胜利说成“天心眷佑”，“紫微星下界，天降谴责于满蒙”^②，是“上天所定，非人力之私修”^③，尚可取得信服，而当起义军节节失利后，上述舆论不攻自破，反而起了涣散军心和消磨革命斗志的不良作用。特别是在具体战役不讲究战术，靠“法术”和“咒语”去吓唬敌人。比如，十月二十七日起义军在建昌县东南瓦房店和官军首次接火。起义军当时有二千多人，起义军首领没有带领军队抢占有利地形，严阵以待，而是“道巾衫衣，执剑作法，状若疯颠”，其队伍散乱不整，“蔽野而至”。战斗开始后，官军首先用快枪将“道巾衫衣”的义军首领击毙，官军又乘义军惊慌之机从两翼攻击，以致起义军留下“遍野横尸”，无首的余众“缘山奔逃”^④。这样的战法，自然要常吃败仗。

第二，战略战术上有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⑤金丹道教的起义首领在战略上主要是犯了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抗御进攻之敌的错误。起义之初，在清朝驻当地官军和蒙古兵数量少且无战斗力的情况下，采取“分兵占地”的战略方针，无疑是对的。但是在清政府派直隶、奉天官军从东、西两路凶狠地夹击起义军，战争态势发生根本转变后，起义军战术没有相应改变，继续分散御敌，这样不仅粉碎不了敌人的“围剿”，反而有利于被敌人逐个吃掉。起义军大本营开国府陷落前夕，杨悦春开始觉察到这个问题，只是太迟了。在战术上，起义军没有很好运用“攸忽驰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而是凭借“教堂”“烧锅”“当铺”等高墙大院消极防御、死打硬拼，结果失去了主动权，常常处于被关门挨打的境地。如东路起义军约会聚于黑城子，想利用土城“以图久据”，官军三路进剿，起义军被“击毙无数”，首领于发被俘，余众由西门突围，行至大障子，又进入该村墙内，“负隅死拒”，官军越墙而进，义军“退入佛堂”，官军纵火烧毁佛堂，最后这股起义军被“剿除净尽”。本来塞外地域广阔，且又“地势复岗垒嶂，山岔纷歧”^⑥，适于神出鬼没、声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619—620页。

^② 李玉廷：《金丹道教起事亲历记》，《昭盟档案馆政协文史资料卷》一百二十八。

^③ 扫北武圣人李国珍张贴的布告。

^④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3001—3002页。

^⑤ 《毛泽东选集》卷二，第400页。

^⑥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013页。



击西的游击战术，然而起义军没有这样做。

除此，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种族歧视、种族压迫政策，离间蒙、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致使起义军在战斗过程中，没有把蒙古王公和蒙古贫民区别开来，犯了扩大打击面的错误。起义军攻入敖汉贝子府后，“凡遇蒙古人无论男女，一刀一个，尽行屠戮”，结果“贝子亲丁二十三口，附近蒙古千数百人，当府破时，只逃出小贝子一人，其千数蒙古死于府中者半，死于府外者半，计其存者仅数十人耳”^①。当然，这段文字出于地主阶级文人之手，难免有夸大不实之弊，但也不能不说，起义军没有很好同蒙古贫民团结战斗，失掉了他们的支持，影响了队伍扩大和军需的供给，这也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金丹道教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却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教训了外国侵略者。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秩序，“诚恐死灰复燃”，“酿成巨患”，除“留兵弹压”外，“不得不慎重对待，不得不做让步”^②。

第一，减轻了蒙古王公对汉族贫民的剥削。清廷鉴于蒙古王公靠权力“强霸取财”，“抢夺余粮”，激起贫民“结党抗拒”的事实，而“更定新章以弭嫌衅”^③，即由都统派员和地方官吏一起，查明每户租佃土地的亩数和应交的租银数，以及田地四址、催头姓名，编立鱼鳞结册，界以执照。秋天收成以后，州县官吏代替蒙古王公征收租税。新章还规定，收租官吏不得“从中侵漫或加倍重征”，否则“严重治罪”；还规定商民和蒙古王公进行贸易，“彼此赊欠致有亏折之事”，不准蒙古王公“私行责罚”，由地方官“持平论断，毋稍偏倚”^④。当然，这些多是纸上堂皇之言，不会完全施行，但在一定程度上对调动汉族贫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塞外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迫使地方官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动气焰有所收敛。比如，光绪三十二年，朝阳知府俞公良奉令创办四乡巡警并兼设小学堂三十四所，清廷不拨款，强迫转嫁到百姓身上。百姓“无力应命，遂逮起暴动”^⑤。对此，俞知府没敢派兵镇压，而是“立即转环出示晓谕，巡警可理办，学堂暂行缓立”^⑥。此事热河都统廷公闻讯后，谈虎色变，“深责俞府办事不善”。

另外，清廷利用蒙族统治奴役汉族的民族歧视政策也略有改变，如各州县官吏改变了“向系专用旗员”的作法，改为“满汉兼用”^⑦。

尽管这次起义没有酿成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没有直接埋葬清王朝，但它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它不愧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①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

② 《列宁全集》卷六，第464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100页。

④ 同上书，总第3101页。

⑤ 《朝阳县志》卷三十三。

⑥ 同上。

⑦ 《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086页。